

11 个美国人 与 现代中国

李庆余 主编

ANHUI DAXUE

CHUBANSHE

SHIYIGE MEIGUO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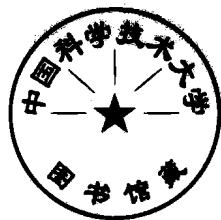


XIANDAI ZHONGGUO

安徽大学出版社

11 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

李庆余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合肥

11 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

李庆余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9)

铁四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

开本:850×1158 1/32 印张:10.75 字数:270千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

※

责任编辑:鲍家全 封面设计:孟献辉

责任校对:李梅 版式设计:鲍家全

ISBN 7-81052-095-4/K·10 定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11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是一本以人物为中心论述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著作。书中11位美国人都是对华政策的决策人或参与决策的有影响的人物。本书不同于中美关系的编年史书,它把中美关系置于美国外交的大框架中,旨在突出美国对华一系列重大决策、决策背景与决策人的思想风格。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中美关系史上发生的事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这些事件背后美国的决策过程与有关决策人的世界观与中国观。本书对决策人的环境与思想给予更多的注意与阐述。希望这一做法能够符合读者的要求,成为中美关系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张主义,本书的开头就对此加以论述。这一观点也贯穿于全书始终。

美国对华政策是在美国外交的大背景中发生,并且是其愈来愈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美国完成经济现代化,进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这时,美国外交的主旋律是把美国从经济大国变成政治大国,在国际上确立大国地位。“门户开放”照会是美国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后,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美国不满足于保持与欧洲大国和日本一样的大国地位,试图充当世界领袖,按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建立国际新秩序,一个美国型号的霸权主义。从此,中国被纳入国际新秩序框架,对华政策是在这一框架内制定的,威尔逊在一战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这样,罗斯福的四强(美、英、苏、中)治理世界的方案也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但它的国际新秩序遇到了苏联的挑战,苏联试图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建立自己的霸权主义。美苏对峙与冷战的实质是由谁来领导世界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冷战波及到整个世界,也制约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本书强调了把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置于冷战环境中去认识。1989年东欧剧变与1991年苏联的瓦解标志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当西方的一些人为此喝彩时,现实清楚地昭示,冷战的结果是它的主角(苏联与美国)一死一伤。历史没有回到冷战发生之前。美国将面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与一个因实行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而崛起的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不得不面对世界多极化与中国的崛起而加以调整。这一政策至今尚在形成之中。

制定与推行对华政策不仅决定于外交大背景,而且与决策人的个人思想风格有密切关系。历史是人的活动,不是一种抽象观念的事先安排。读者读完本书,当会对这些决策人的个性留下印象。然而,不管这些决策人的个性有多大差异,整个说来,他们都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国中产阶级传统上怀有理想主义,从建国初就认为美国是“人类最好的希望”,一心要与腐败的欧洲划清界限。当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大国时,美国更为其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无比自豪,渴望把美国的价值观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视它的参战是拯救欧洲与人类,为领导战后的世界铺平道路。美国决策人的乐观、自信、傲慢都是这一理想主义的表现。然而,当这一理想主义遭到挫折时,他们也会变得务实,善于冷静思考并进行政策选择。从海约翰到克林顿,我们都可看到美国决策人的这一外交风格。这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固有的现实主义。但务实不意味着放弃理想,而是为了新的条件下实现理想。本书中的美国决策人向我们表明,他们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对美国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的把握会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决

策过程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近一二年来,书坊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等一类以“不”为书名的书,一时间引起人们的兴趣与评论就是证明。因此,对于中美关系这样重大而敏感的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加以研究与阐发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但我们认为,鼓吹“不”字,以“不”来处理中美关系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不符合 20 世纪所展示的中美关系的历史事实。

在 20 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冲突与敌对,我们也看到了中美利益的汇合。《11 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一书对此作了阐释。例如,“门户开放”照会主观上是美国为了争取大国地位与在华的同等待遇,客观上对中国保持领土完整,特别是在一战后阻止日本独占中国起了一定作用。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结盟,美国的外交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期间的美国外交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可以实行国际合作的证明。即令在冷战期间,中美两国仍然存在利益的汇合。当 60 年代末苏联霸权主义逞雄时,中美两国都感到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符合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尽管这两个国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敌对,但这不妨碍它们在反对苏联的扩张方面实行战略合作。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中美两国仍有着战略、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利益汇合。美国是世界上经济与技术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向美国开放。由于这两个世界大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因此,通过对话与交往,特别是决策人的互访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正确方针,完全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追根溯源,最早对美国说“不”的是日本人。前几年,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写过《日本人敢对美国说不》这么一本书,向美国发出挑战,曾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取得了一点轰动效应。众所周知,日本曾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之一。二战后不久,日本重新崛起,至8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日美两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日本人敢对美国说不》正反映了这两个经济大国的矛盾与竞争。显然,用那个“不”字来表达中美关系的走向是不合适与不正确的。如上所述,中美关系不是一个说“不”的关系,其复杂性与可塑性不是一个“不”字所能表达的。以一个“不”字来对待中美关系只会扩大分歧,导致对抗。“不”反映的是一股狭隘的封闭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与维护国家利益,保持中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与形象是格格不入的。本书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汇合的阐释,将会有助于消除这股情绪及其给读者造成的思想混乱,正确理解我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方针政策。

本书由李庆余策划,拟订写作提纲,组织写作班子,以及进行统稿与定稿。本书七个部分依次由李庆余、蒋万海、夏修开、赵瑞琦、钱春泰、郭海儒、孙唐水著述。安徽大学出版社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积极支持,这才使书稿得以顺利出版。本书责任编辑鲍家全也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者,他认真仔细地审读了书稿,并在多处作了并非不重要的文句改动与润色。谨对他们致谢。

欢迎专家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李庆余识于南京大学文科楼

1997年9月10日

目 次

序.....	(1)
--------	-----

海约翰与柔克义:保持中国门户开放	(1)
------------------------	-----

合众国政府的政策是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它可以为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定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捍卫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海约翰

中国现在是,以后还会是一个热点。

——柔克义

威尔逊与罗斯福:在中国寻求新秩序.....	(39)
-----------------------	------

国联成员国保证尊重与维护所有联盟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存的政治独立不受外部侵略。如发生任何这样的侵略或出现这样侵略的威胁或危险,行政院将提出履行上述义务之手段。

——伍德罗·威尔逊

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

史迪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95)
-------------------	------

我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怀有信心:根本上是伟大的,讲民主的,但受到了不当的管理。没有种姓和宗教界

限,……诚实,节俭,勤劳,愉快,独立,容忍,友善,谦恭。

——史迪威

杜鲁门与马歇尔:为中国选择道路 (123)

世界和平不是靠多打几次仗可以获得的。……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

——哈里·杜鲁门

列强应当怎样对付中国,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常的答案是绝对找不到的,我们只能希望外国人能够高明到在此困难时期避免使用暴力。

——乔治·马歇尔

司徒雷登:一个美国传教士梦想的破灭 (182)

我是为了中国,别无其他。

——司徒雷登

尼克松与基辛格:从遏制到均势 (232)

在今后几十年内,我们必须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它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理查德·尼克松

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有才能的民族和有辉煌成就、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继续隔绝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亨利·基辛格

克林顿:面对中国的崛起 (288)

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在上世界上发挥适当的作用符合美国的利益。

——克林顿

主要参考书目 (328)

海约翰与柔克义： 保持中国门户开放

合众国政府的政策是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它可以为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定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捍卫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海约翰

中国现在是，以后还会是一个热点。

——柔克义

中产阶级的扩张主义

工业中产阶级的崛起 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1893年,美国工业居世界第一位,而且,美国经济发展仍是强劲有力。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已经得到很好的开发,但还存在巨大的潜力。美国企业家也在积极谋求扩大国外市场。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正在发生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中产阶级崛起,正在替代农业中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新兴工业中产阶级放眼世界,孕育大国心态,谋求大国地位,力图使美国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由地区大国成为世界大国。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外交的主旋律,也是对华外交的主旋律。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拒绝卷入欧洲的政治与战争,反映了农业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19世纪90年代的扩张主义者,要求摆脱孤立主义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公众舆论与扩张主义思想反映了工业中产阶级的心态与要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写道:“孤立政策已经死亡。……我们看来有了一个新的意识——力量的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欲望,即显示我们力量的意愿。野心、利益、渴望土地、自负,仅仅是以斗争为乐事,无论如何,我们是为一种新的感觉所激励。”最有影响的扩张主义者、“海权论”的提倡者马汉的口号是“向外看”。他说:“不管美国人愿意不愿意,现在他们必定得开始向外看,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它,公众愈益发展的感情要求它。”

参议员卡伯特·洛奇在1895年抨击民主党政府“搞错了外交政策”,认为美国现在必须抛弃孤立主义,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世界大国。他说:“大国很快地被它们未来的扩张与保卫地球上的不毛之地所吸引。……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不能置身于这场运动

之外。”洛奇、西奥多·罗斯福等一批年青的扩张主义者炮制了一个所谓“大政策”，即世界性的扩张政策。按照这个政策，中南美洲这个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仍是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地区。于是，1898年，美国在“自由古巴”的口号下，向西班牙开战，结果古巴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而这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成了美国的保护国与美国控制加勒比海的据点。美国通过这次战争还把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菲律宾变为它的殖民地。在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占领菲律宾不久，麦金莱总统毫不讳言地说：“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变成了世界大国。”

东亚与太平洋是美国扩张的另一个主要地区。美国政府在几经踌躇后决定占领菲律宾群岛，是出于建立太平洋商业优势的需要，即利用菲律宾作为跳板，进入中国，控制东亚。

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西方列强开始掠夺中国领土，瓜分中国。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外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外国势力从此入侵中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高潮，在这一扩张高潮中，展开了对中国领土的掠夺与瓜分。

割占台湾：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并取得对中国的胜利。1895年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从中国割占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获得库平银2亿两的大赔款。由于德、法、俄三国的干涉，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作为补偿，日本又从中国得到3000万两白银。

中俄密约：日本占领台湾激起了列强特别是德国以及毗邻中国的俄国的领土野心。西伯利亚大铁道的建筑是俄国在东亚扩张的重要部署。该铁路从1891年动工，至1901年（除黑龙江一段外）已全线通车。从此，俄国可以直接从欧洲调兵至中国东北，与日本等国家展开竞争。三国干涉还辽是日俄争夺东北的第一个回合。此后，俄国加紧向中国渗透。1896年，中俄签订密约。这一

条约规定,俄国有帮助中国反对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权利。“当(中日)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舰驶入。”条约还规定,由中国政府请俄国道胜银行出资建设中东铁路,即从长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接。

瓜分中国狂潮: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曾向清政府提出,以在天津与汉口获得两块租借地作为报酬,德国还想在中国取得一个港口停泊军舰。1897年11月,德国政府以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为借口,占领了胶州湾。次年初,与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胶州地区成为德国殖民地,整个山东省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德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此外,还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大连湾连接中东铁路,即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此后,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租占威海、九龙。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筑路权也被它们攫取。所谓“租借地”、“租界”、“租借港口”实际上已成为殖民地,成为列强在中国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据点。所谓“势力范围”是走向独占的殖民地的过渡形式。中国面临领土瓜分的危机。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不过它们开始不是公开地瓜分,而是像窃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瓜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中译本,17-18页)列强在瓜分了非洲大陆与亚洲的其他地区后,对中国的瓜分就成了国际竞争的热点。列强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中国这个国际热点上表明态度、发挥作用,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世界大国。当瓜分中国开始时,美国正忙于准备和进行美西战争。一俟战争结束,美国就决定参与这一竞争,以维护美国在华的大国地位与商业利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美国人的心态时所说:“19世纪末,美国开始感觉到,在亚洲拥有势力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必需的。美国在美西战争后是一个世界强国,所以它必须在远东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美国表演的主题词是“门户开放”,它的导演是门

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与国务卿海约翰。

扩张主义思潮 当美国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时,一股新的扩张主义思潮正在形成。这一思潮主要有三个内容。

其一是鼓吹沙文主义与战争。

扩张主义者希望,战争将会创造一种“新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会使局部的地方性的敌对消散,而使美国人具有一种世界眼光,把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西奥多·罗斯福是沙文主义与战争的最狂热鼓吹者。他的口头禅是“国家的光荣”。所谓“国家的光荣”就是指美国的大国地位。罗斯福选择了这一充满“爱国激情”的词语来“激励”他的同胞为美国的大国地位而奋斗,甚至不惜一战。他鼓吹战争,试图通过战争表现美国的力量,赢得世界对美国大国地位的承认。他是美西战争最热烈的鼓吹者。在海军学院的一次演说中,他公然宣称:“所有统治别人的伟大种族都是好战的种族。”这次演讲在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动了扩张主义潮流的前进。在读了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后,他说,这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他更加相信“海军是大国地位的标志,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海军,否则就得下定决心,充当国际事务中的第二流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上也是如此”。在鼓吹沙文主义与战争时,罗斯福对企业家和反帝民主派表示反感并加以抨击。美西战争前几年,刚刚经过1893年大萧条的企业家对战争表示忧虑,他们担心战争会打断刚刚出现的经济复苏与繁荣。罗斯福指责这些企业家是胆小的、不爱国的,把企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长期享有和平生活是危险的,他们会丧失刚强无畏的品质,失去远大的眼光。因此,发生一次战争对美国人民是必要的。罗斯福还严厉抨击坚持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反对海外领土扩张的反帝民主派,斥责他们是“叛国的”。作为美国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代表,罗斯福认为这些民主派仍然固守老的眼光,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在新

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中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批不识时务的、目光偏狭的“乡巴佬”。罗斯福、马汉等扩张主义者都竭力为美西战争辩护,认为美西战争是一次“绝对正义的战争”。

与罗斯福的“国家的光荣”相“辉映”,另一个激进的扩张主义者贝弗雷治用“国旗的进军”来形象地描述美国海外扩张,这个口号具有同样浓重的沙文主义色彩。贝弗雷治告诉他的同胞:“美国当前的扩张不过是做国父做过的事情——我们只是继续国旗的进军。”他认为,这是美国的世界责任,不能逃避。美国进军古巴与非律宾是用自由与文明拯救这些地区,“为了自由、文明与履行上帝的诺言,这面国旗今后必定是全人类的象征与标志”。

19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海军是推动扩张主义浪潮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海军之父、海军将领卢斯认为,战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战争是影响人类进步的最大因素,虽然会伴随恐怖,但战争是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文明的真正的进展经常是通过战争来取得。17世纪英国的国内战争产生了君主立宪制,美国内战消灭了罪恶的奴隶制。在这个世界中,这种或那种冲突看来是自然规律。”没有战争,“生机勃勃的”力量“会萎缩”,一个奢华的世界“比剑更具有毁灭性”。卢斯还以中国为例来支持他的论辩。他说,中国是由于没有同更优越更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而造成了社会停滞。“今天的中国提供了一幅如果没有战争,现代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的图画。”

与此同时,这些扩张主义者与被他们所蛊惑的社会舆论也认为沙文主义与战争有助于国内改革和完善工业社会。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发生过激烈的动荡。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垄断的产生,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几乎导致美国社会发生分裂。面对这一严重情景,美国中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改革来完善正在形成的工业社会,克服工业化出现的弊病,这就是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扩张来缓和社会矛盾,

用沙文主义与战争来重建社会的凝聚力。在罗斯福、贝弗雷治这批年青的激进的扩张主义者看来,美国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与长期的和平会损害这个民族从殖民地以来所培养的刚强与战斗的气质,会使它变得懒惰与自私。他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一个工业的城市社会保持这样一种气质。答案就是实行扩张与战争。在他们看来,英勇的精神只能来自战争,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保持自己的战斗品质。他们对社会动荡与分裂表示忧虑。如卢斯所说:“富裕与轻易获得成功,削弱了最强盛的气质,不能胜任持久的事业。”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用其他办法解决不了的国内问题,才能净化一个国家的精神。马汉在提出用海上权力制胜外部敌人时,也想到了内部的弊端会使一个没有美德支撑与强有力的爱国主义团结的社会被推翻。他认为,国家同家庭一样,要想避免狭隘的自我满足与可悲的内部纷争,就需要向外看。他断言,美西战争真正的收获不是领土,因为这些土地比起我们国家先前的领土增加与最近欧洲大国的领土扩张真是“微不足道”,“国家在扩张中真正的收获是更新思想,即心情振奋”。美西战争结束后,公众舆论反映了社会的解脱感,认为经过这一场战争,美国不仅得到国际威信、实际利益,而且改善了美国社会的品质,虽然是无形的,但确是意义重大的。有一家杂志认为,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影响是“提高了我们国家生活的声调”。一家报纸宣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城市的犯罪率已急剧降低,因为战争“把此前从事卑鄙与不光彩事情的人们的心纳入爱国与高尚的通道”。沙文主义是美国为它的社会团结付出的沉重代价。

其二是宣扬国家的使命感与建立太平洋文明。

使命感早就是美国外交的思想与理想。到19世纪末,这一使命感促使将美国扩张描写为“文明的扩展”,即西方文明向东方民族的扩展。扩张主义者认为,“亚洲的分裂”已在眼前,这将使亚洲最终置于西方影响之下。净化与推动这些亚洲民族是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职责。美国应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用我们国家的榜样”去教导古巴人与菲律宾人。历史学家阿尔伯特·B·哈特在1901年写道：“谁能怀疑美国人民的目的不仅是使国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也是在向东方扩展西方文明？”工业化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英国传入美国，这个“社会进化论”思想把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教条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也就是说，人类也存在着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是违反自然选择规律的。这一理论很快为大企业家和扩张主义者所利用。他们认为，财富是成功的标志，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美国对外扩张是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履行教化不能适应自然的落后民族的责任。乔赛亚·斯特朗牧师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鼓吹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特定意义上被上帝指派为其兄弟的监护人”，他把19世纪80年代高涨中的西方殖民扩张解释为种族竞争。“任何人会怀疑这场种族竞争的结果将是适者生存”？他当时就警告美国人不要坐失良机，赶快参与竞争。19世纪90年代的扩张主义者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皈依者，都用“扩展文明”这一新鲜动人的口号来赢得公众对扩张的支持。马汉写过大量文章宣扬“文明扩展论”。他描写西方文明是“野蛮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众多的野蛮的种族包围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它比它们强大，富有生命力。马汉确信，文化竞争的命运将在即将开始的时代——20世纪最后得到解决。基督教文明面临的挑战是要把那些包围它并在数量上超过它的古老的不同的文明纳入进来，并唤起它们自己的理想。马汉指出，当亚洲古老的种族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时，它们一定要得到真正的启蒙与基督教精神的教导，否则，它们在逐渐取得物质进步时只不过是变得更为野蛮，更有能力用它们的力量去打倒西方。1893年美国国会与公众就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展开讨论时，马汉从两种文明的冲突来看待这一问